

# 向着星空的“长征”

■陈永华

去。大家连续做了三天两夜，终于成功。这是最困难、最疲劳的一次实验。实验结束时，詹奎整个人像散了架，胃疼、恶心，吐出来的都是黄水。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那是一段艰苦而又温暖的岁月，再苦再累，没有人退缩。强国的梦，支撑着他们迎难而上，义无反顾，踏上迈向星空的长征路！

## 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有人说，中国航天人不是神却干出了神话般的伟业，不是超人却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其中靠的是担当与奉献。

1970年3月的一天，詹奎接到通知：带上图纸资料及日常生活用品，到基地开会。当他赶到时，才知道上级要他随运送卫星和火箭的专列出发去基地。“651”工程已进入酒泉基地的试验阶段，各设计制造方代表多数已先期抵达基地。

这是一趟保密程度极高的军运专列。除詹奎等几名技术人员外，乘车的只有警卫班、一名军代表和总装车间外厂组的几位师傅。

50多年后，回忆起兼职当炊事员的老师傅，詹奎笑着说：他做的肉末雪里蕻特别好吃。只可惜他给得少，我没吃够过。他还回忆起另一件事。1967年，他母亲病重，花去近1200元治疗费用。当时一院已归地方编制，不再发军装，他也没钱买衣服。毕业分到酒泉基地的同学徐祝来京出差时，把准备上交的七成新军装带来给他接着穿，再把他已不能再穿的破旧军装带回去上交。

几天之后，列车抵达酒泉基地，由基地接管。设计制造方代表密切注视官兵执行任务时的每一个动作，不放过卫星前的任何一个细微反应。詹奎先后发现了火箭第一二级的级间分离线路故障、陀螺仪飘移数据不正常这两个问题。

陀螺仪是对制造环境要求极高、制造工艺极复杂、造价昂贵的仪器。若调错了飘移，就会造成火箭飞行偏差，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时任七机部军管会第一副主任的杨国宇在会上对詹奎进行了表扬。

“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总理对工程量的要求，也是航天人坚守的信条。在“651”工程实施过程中，有些人认为应该先进行长征一号的单独（即不搭载卫星）飞行试验，而杨国宇坚持让长征一号的首次飞行就放卫星。

这种精益求精、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认真严谨，可谓是航天人的“生命”；不畏艰苦、无私奉献、永不言弃的奋勇拼搏，可谓是航天人的精神内核。正是如此，才成就了航天人的高贵品质和非凡业绩。

詹奎的大学同学张振河被分配到基地一部，在星箭测试时操操纵员，负责在

控制台上完成各种操作，对箭上控制系统进行检测。他的爱人王书真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后，也调到基地。此后数十年，夫妻俩一直工作在大漠戈壁。张振河回忆说，当时很有希望赶在日本之前放卫星。但是在前期测试过程中，首次使用的气浮陀螺出现抖动，需要发回北京，大家都很有压力。钱学森安慰大家：能跑到日本前面更好，跑不到前面就跑后面去嘛，最终保证成功是第一位的。

在完成水平阵地全部检测工作、将要转入发射场时，周总理派一架伊尔-18大型飞机来基地，接主要负责人及一线技术人员代表到北京向总理领导的中央专委汇报。负责控制系统研制的十二所副所长沈家楠，平易近人，敢于放手让一线技术人员挑重担。他没有去参加这个光荣难得的工作，而是指派詹奎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代表参加汇报小组。

这是詹奎81年人生记忆中引以为豪、终生难忘的精彩华章。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如此重大又无上光荣的科研任务，并能够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这是巨大的政治荣誉和组织对本人科研技术水平的高度认可。

## 三

上下同欲者胜。

作为新中国迈向太空的奠基工程、战略工程，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对“651”工程高度重视，寄予深切期盼。

1970年4月14日晚，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由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主持，参加的还有国防科委副主任罗元发，王秉璋、钱学森，酒泉基地政委栗在山等。

汇报开始后，周总理先按名单点名，并一一询问年龄、籍贯、毕业学校。总理点完赵岳琦、任新民，第三个就点到了詹奎。与会人员中，他的年龄最小，一个月后才年满30岁。总理又问他是哪里人，詹奎回答是安徽人。

作汇报的主要是任新民，汇报过程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就由相关的技术人员作答。詹奎作答的是控制系统计算机可靠性问题。聆听汇报现场的问答，他对周总理严谨务实的作风感受深刻。一院一部的同志提到火箭燃料中氧化剂和燃烧剂的混合比误差数据时，总理说，误差大了，要精益求精，叮嘱他们要向当时上海成研所指再植手术的专家陈中伟医生学习。

在测试火箭第三级姿态控制系统时，控制态态的喷管会突然喷气，测试的同志怕是漏气，将这个问题提到汇报上来。钱学森解释说，这是非线性控制系统工作时的正常现象。简单一句话，明白易懂，加上他权威专家的身份，总理放心了。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今年是《解放军文艺》创刊70周年，这让我不由地回忆起一些往事……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志愿军一日”征文活动，由参战各部队抽调人员参加征文的编辑工作。于是，1955年5月我扛着行李卷，从朝鲜回国到位于北京莲花池的“志愿军一日”编辑部报到。主持这个编辑部工作的是《解放军文艺》行政组长刘亮。他教我们如何写稿签，如何选稿、改稿，直至如何校对。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对待来自部队指战员所写稿件的珍视与热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完成《志愿军一日》这部巨著的编辑出版工作后，我又返回朝鲜部队驻地。从朝鲜撤军回国后，我随部队赴西藏高原执行任务。这期间，我业余创作了诗歌《一壶水》、散文《遥远边疆的黎明》《边巴甲波》《普布扎西的战友》等，先后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不久，边防部队涌现出一名爱民模范洛桑丹增。《解放军文艺》社的李瑛、纪鹏、美编陈亦逸前来西藏组稿，约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创作叙事诗《洛桑丹增颂》。后来，诗作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后，还出版了单行本。可以说，我的业余文学创作是在《解放军文艺》的引领下起步的。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1979年7月，我又扛着行李卷从成都来到北京的黄寺大院报到。这一次，我是调解放军文艺社工作来了。从一个《解放军文艺》的业余作者变为《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使我有了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感觉。要知道，《解放军文艺》是全国、全军读者喜爱的文艺刊物。1951年创刊时，原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写给军委副主席刘少奇的报告中说：“为供给部队干部及文艺工作者的读物，指导全军文艺活动，鼓励部队文艺创作，总政治部拟出版《解放军文艺》月刊，并拟对外公开发售。”朱德总司令为《解放军文艺》题写了刊名并题词：“更深刻更广泛地开展部队中的文艺工作，要在部队中大量培养有创作能力，并与人民解放军战士保有最密切联系的文艺工作者。”

《解放军文艺》创刊后即发表了毛主席和数位革命前辈的作品，文学大师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也先后赐稿。在宋之的、魏巍等主持下，军事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如王愿坚的《党费》、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杜鹏程的《沙家店》、刘知侠的《列车上的战斗》、刘白羽的《路标》、吴强的《吐丝口》、陆柱国的《上甘岭》等。在这样坚强有力的文艺期刊编辑部工作，我只有好好地从头学习了。当时，解放军文艺社总编辑奇同志对我说，我们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旗帜，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培养军事文学创作队伍，推动军事文学发展繁荣，用精美、健康的精神食粮，鼓舞斗志，壮我军魂，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解放军文艺社除编辑出版《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歌曲》，还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昆仑》，出

版系列军事文学图书，举办多次笔会和创作学习班。为反映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解放军文艺》举办“中国潮”征文活动，推出了江永红、钱钢的《蓝军司令》，朱秀海、袁厚春的《河那边升起一颗星》，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等作品，被文艺界誉为“开创了中国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先河”。

小说有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方南江、李荃的《最后一个军礼》，王中才的《三角梅》，刘兆林的《雪国热雨镇》，周大新的《汉家女》，莫言的《高粱酒》，海波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翔？》……

解放军文艺社有扶持业余作者的优良传统。建社初期，即精心编辑了长篇《解放军文艺》月刊，帮助冯德英出版了“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精心编辑老将军萧克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并荣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出版了《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我们还为全军基层单位配发优秀图书，推动官兵阅读活动。1985年4月，我带工作组把解放军文艺社的书刊送到边境作战前线部队驻守的“猫耳洞”里；1992年1月，我又带人把《解放军文艺》《昆仑》等书刊送到南沙群岛守礁战士们手上，在永暑礁上召开座谈会，听取一线官兵对书刊的意见和建议……

今天，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我衷心祝愿《解放军文艺》以崭新的风貌，为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做出新的贡献。



我的脑海。我马上打电话给急诊室，申请领取青霉素注射液。值班员不太理解地问：“什么？猪病了？三更半夜的取药，明天不行吗？”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等到明天就可能传染更多的猪发病。”对方回答：“来拿吧。”我跑步取回针药，在两头猪耳后2厘米处分别注射了足量的药液。这一夜，我忙到凌晨三点才休息。次日晨，我摸摸那两头病猪，已经不发烧了，吃食的精神状态也基本恢复正常，这才放下心来。

深秋，小猪已长成出栏猪，每头约有150公斤重。我喂的13头肥猪，足以满足医院战士灶和干部灶的肉食之用。

这13头肥猪出栏后，连队又买回27头小猪，仍由我来喂养它们。我还首次照顾两头母猪顺利产下了小猪崽。

那两年，我多次受到连队嘉奖，并被评为本单位学习工作标兵。1980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很快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亲人、朋友，与他们分享这份幸福和喜悦。

从入伍之日起，我就抱着“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信念，用心地对待每一项工作。后来，我被推荐到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上学4年，圆了我的军医梦。毕业后，组织上先后安排我到深山采药、在急诊室做护理工作、下连队担任卫生执勤任务等，我都听党召唤，努力干好本职工作。直到68岁那年，我还主动申请赴雪域高原日喀则分院，圆满完成了首批代岗任务，受到医院领导的表扬。

在建党一百周年到来之际，作为一名老党员、神经内科和医学心理学专家，我每每回忆起当年站在党旗前宣誓的情景，都会激动不已。因为那是我心底最珍贵的记忆，那里有我的信仰、我的爱，有一团火一直在炽热地燃烧……

## 心中有一团火

■戴光明

猪们分区生活，健康活泼，大多时候还能按我的口哨音行动，我心里雨提多高兴了！

重庆的春夏之交，一夜间气温飙升到30摄氏度。猪圈大部分面积暴露于烈日之下。小猪们被晒得直喘粗气，吃食也不欢了。为了防止它们中暑，我用了3天时间到附近小树林拾树枝，为猪圈搭起凉棚，每天还增加了两次洒水。猪儿们恢复了以往的欢实，见我走近，就会点点头、摆摆尾，还发出欢快的叫声……

小猪们日渐长大，原先麦麸加剩饭已远不能满足它们的胃口。我没有向连部要求多购猪饲料，而是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在附近池塘边割青草补足。一次正割草时，一只硕大的蜜蜂直蛰我的左手背，突然袭来的剧痛使我差点栽进池塘里，瞬间左手背肿起像个馒头。定了定神，我三步并作两步直奔急诊室清洗消毒。还有一次，我在利用食堂的面汤煮食时，不慎滑倒，右手插进面汤大桶中。滚烫的面汤直灌入棉衣袖中，到急诊室剪开衣袖按深二度烧伤进行了处理，右肘部疤痕直到近年才逐渐消退。经过这两次意外，我并没有掉泪，更没有嫌弃养猪的辛苦，仍一如既往地深爱着这份工作。

随着秋天来临，有一天夜里，我突然发觉有两头猪吃食少、精神差，一摸耳后滚烫。发烧了！“猪瘟”两个字立即闪入

## 入党故事

回望初心，点亮征程

1970年1月，我终于穿上了心心念念的绿军装，被分配到一所军医大学勤务分队当战士。当时，我心中有两个梦想，一是入党，二是成为一名军医。离军医最近的岗位，就是护理员，剩下的岗位有电话兵、通信员、警卫员、勤务兵和炊事员。没想到，新训结束后，分给我的工作是饲养勤务连战士灶的13头小猪。虽然我心里很羡慕当护理员的战友，但由于红军家庭出身的教育熏陶，再加上3个月的新兵训练，让我牢牢树立了“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思想，于是爽快地接受了这项艰苦的工作。

猪13头，饲养员就我一个。每天晨起跑完操后，我就直奔猪圈，接上胶皮管，冲满满是尿尿的猪圈，然后用头晚煮好的猪食喂它们。每天中晚餐后，我分别将全院的残汤剩饭用铁桶挑回，再配上麦麸煮熟，以次日喂用。那时正值春季，听说春天易发“猪瘟”。为了防疫，保证13头小猪能健康出栏，我将猪圈分成摆猪槽的A区和供排泄的B区。为了训练它们养成规矩，我每天除参加连队集体活动外，基本上都泡在猪圈。3个月后，目的基本实现。看着小

江城子

## 红船

■牟仕豪

惊涛骇浪，力挽狂澜。  
日出东方，航迹划出彩色的黎明。  
拥抱朝阳，浪花汇成绚丽的画卷。

又到七月，灿烂的夏天，  
新时代的航船，在霞光里扬帆。  
风雨百年，誓言未曾改变。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够实现。  
砥柱中流，接力奋进，  
一路向前，风光无限。  
日出东方，不忘梦想开启的地方。  
中国巨轮，驶向伟大复兴的明天。

乘风破浪，有你领航，  
一路向前，风光无限。  
中国巨轮，驶向伟大复兴的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够实现。

## 蓄势待发

(油画)

第五二八期  
窦鸿作



## 百年风华

情至心处诗最美

## 七月的誓言

(歌词)

■贾永

那个七月，多雨的夏天，  
一条红色小船，冲出沉沉夜幕。  
理想的火炬，把初心点燃，  
鲜红的旗帜，激荡信仰的风帆。  
开天辟地，有你掌舵，